

论周作人早期翻译活动与国语改造主张之关系

李 晓 晗¹⁾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ou Zuoren's earl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National Language reform

LI Xiaohan

Abstract

Zhou Zuoren created while translating foreign literature a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reform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Zhou Zuoren's early translation work focused o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introduced the influence of Japanese into Chinese vernacular literature. By analyzing Zhou Zuoren's early work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we can clearly examine his translation motivation, translation thoughts and translation methods. Since Zhou Zuoren's proposal of Mandarin transformation was carried out almost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his proposal of Mandarin transformation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ranslation.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Zhou Zuoren's early translation activities and his view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e can learn that Zhou Zuoren's views o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re in common at the linguistic and ideological levels.

Keywords: 周作人; 翻译动机; 翻译思想; 翻译方法; 国语改造; 白话文

一、周作人早期翻译概况

周作人一生致力于日本文学翻译,从留日期间一直到晚年,不断向国内介绍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周作人翻译工作的前期,即五四时期主要关注日本现代文坛的不断变迁,以及日本文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作用;后期即新中国成立后,则关注日本古代文学中的东方传统文化。周作人

1) 【作者简介】李晓晗,关西大学东亚文化研究科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lixiaohan19941130@gmail.com

的日本文学译作，是中国翻译史上涉猎范围最广，最具有时代历史价值的著作。从五四运动前期翻译的第一篇日文短篇小说《小小的一个人》，一直到六十年代《平家物语》第七卷的翻译完成，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活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将数十位日本文学家及其作品较全面地介绍给中国，其翻译作品自成体系，至今仍又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在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不同时期，随着周作人日式生活习惯的加深，以及对日本文学的理解，翻译作品的文学形式与内容也有很大差别。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为1918年至1928年，1918年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研究会做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并刊登于1918年5月刊《北京大学日刊》141-152号，首次对日本明治及大正三十年间文学的变迁与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梳理，这一阶段周作人对日本文学的研究也主要着眼于日本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将这一时期称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第二阶段为1928年至1938年，这一时期被称为冷静的“日本管窥”时期，翻译作品较少；第三阶段为1938至1966年，寻求语言改造、文学变革的翻译动机逐渐消退，翻译作品主要是从审美出发翻译的古典文学，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也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作品中最具有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的，实际上古典文学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即1949年至1966年，也被称为周作人日本文学翻译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在五四时期，周作人所作日本文学研究的文章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关注时下日本文学作品潮流，二是对体现日本特殊精神文化内容的古典文学作品的浓厚兴趣。纵观周作人一生的日本文学翻译作品，内容选择上也符合其文学研究倾向，翻译作品既涵盖了大量小说、短歌俳句、新体诗等多种形式的日本现代文学作品，也广泛涉猎的日本古代文学作品。短篇小说集《现代日本小说集》及短篇小说、剧本合集《两条血痕》中收录了周作人大部分的日本现代小说翻译作品，也代表其早期日本文学翻译活动的主要成就。五四时期周作人翻译了部分石川啄木的短歌，但《石川啄木诗歌集》完成时间相对较晚，是周作人最完整的作家个人作品翻译集，此外其他单独发表的现代文学翻译作品，同以上三部共同收录在《周作人翻译集》的第七卷中，为周作人日本现代文学翻译总集。《现代日本小说集》的翻译向中国介绍日本现代小说，并向中国介绍了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森鸥外、铃木三重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长与善郎、志贺直哉、千家元磨、江马修、江口涣、菊池宽、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加藤武雄等等十五位作家。这本文集里的十五个著作者之中，除了国木田独步与夏目漱石之外，都是届时现存的小说家。²⁾周作人在序言中明确地表达过自己为什么要选择这十五位作家：“至于从文坛全体中选出这十五个人，从他们著作里选出这三十篇，是用什么标准，我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但是我们虽然以为纯客观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观去妄加取舍；方法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著作中，择取自己所能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未免稍狭；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却都有永久的价值的。”³⁾通过周作人的翻译作品和有关翻译的著述，可以对其早

2) 顾农 2006: 4.

3) 钟叔河编 1998: 57.

期的翻译动机、思想和方法进行系统的分析。

（一） 翻译动机

翻译动机表现为翻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主观上的目的性与方向性。翻译动机决定译者选择什么样的作品，以怎样的方法翻译，并影响最终译文的风格特征。因此研究一个翻译家的译著，需从其翻译动机开始。

翻译作为不同国家与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之一，具有时代特征。在繁荣而稳定的当今时代，译者的翻译动机大体上是工作要求或个人审美旨趣。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翻译工作受到时局政治影响，译者们抱有政治目的性而进行翻译，同时作家们为实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改造，以改革者和创作者的身份介入到翻译中。社会变革、翻译和文学创作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译者的翻译动机呈现复杂性特征，这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本土译者们即渴望以翻译启发民智、救亡图存，又希求借助翻译改造国语，因此译者们对“翻译什么”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梁启超指出：“故今儿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月，养能译之才。”⁴⁾ 翻译对象的选择被放在了首要位置，十九世纪末的翻译对象集中于博物地理、政论以及历史方面，所谓的“当译之本”指的就是能够打开国门，让中国人更加了解外国国情的作品。而五四时期的译者们的政教诉求降低，更新中国文艺理论和文学语言的动机增强。

周作人并非完全不继承晚清翻译家的翻译。晚清社会变革思潮引起的翻译必然具有社会性动机，翻译活动符合“师夷制夷”思想相契合。从上文的数据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在译者们普遍的社会变革动机的驱动下，晚清翻译集中于介绍西方的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自然科学等知识层面。周作人作为文学翻译家，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也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想，深感中国社会及国民的弊病，并指出“想要救这弊病，须得摆脱历史的因袭思想”周作人在社会变革的动机上与中国近代以来的译者们是一脉相承的。

但在五四先驱中，周作人的主张和思想最为温和。在周作人身上，似乎看不到像梁启超那样对翻译文学的政治功能的希求，更多的是他个人艺术审美和对语言文字的考量，在《现代日本小说集》的序言中，周作人坦言自己的翻译动机“不得不声明这是大半以个人的趣味为主”。对于“择当译之本”，周作人的观点是“但是我们虽然以为纯客观的批评是不可能的，却也不肯以小主观去妄加取舍；我们的方法就是就已有定评的人和著作中，择取自己所能感受理解感受者，收入集内，所以我们所选的范围或者未免狭隘；但是在这狭的范围以内的人及其作品都有永久的价值的。”周作人这所说的价值，应该理解为文艺的价值，是对中国新文学和白话文的影响，而不是对社会所产生怎样的影响。综上，周作人的翻译动机是比较复杂且辩证的，既有政治变革时代的社会责任动机，也有一个文人的个人审美动机。后者显然是更强烈的，因此和同时期的翻译家相比，

4) 许钧 2004: 51-55.

周作人似乎没那么激进，他的译作也能保留独特的文学价值，在五四时期独树一帜。

（二）翻译思想

周作人早期翻译思想可以总结出三个要点：第一，重视现代文学的价值；第二，重视还原原著，为作品而翻译；第三，将翻译视为个人、民族之事业。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极力主张翻译近现代作品，日本近代文学尤其受到重视。写给沈雁冰先生的信中，周作人说：“陈胡诸君主张翻译古典主义的著作，原也很有道理；不过我个人的意见，以为在中国此刻，大可不必……在中国特别情形（容易盲从，又最好古，不能客观）底下，古典东西可以缓译……我以为我们可以在世界文学上分出不可不读的及仅供研究的两项：不可不读的（大抵以近代文学为主）应译出来；仅供研究的应该酌量了。”⁵⁾周作人认为翻译古典作品虽有道理，但不适宜中国当时的国情，应该酌量。因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国民思想上的诸多弊端，近代文学才是更符合中国读者需要的，有价值的作品。

周作人在翻译活动中一直怀着强烈的求真意识，倡导为作品而翻译。周作人的翻译活动由根据英文本《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编译成的《侠女奴》开始，以及根据爱伦坡小说《山羊图》变异而成的《玉虫缘》，这两篇为试创作阶段的主要作品，此外也有诸多影响较小的翻译作品诞生。周作人的翻译思想也由此开始形成。他的译作中，除了早年的《侠女奴》《玉虫缘》是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观，之后的所有译作都遵循“求真意识”，最大程度上还原原文风格和内容。在清末的翻译活动中，周氏兄弟意识到林纾为代表的翻译家所提出的翻译理论，是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义相一致的，这样的翻译方法导致作品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因此，周作人提出了“真翻译”的看法，翻译作品要符合真实的原作，中国读者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内容和思想两个方面都要符合真实。在内容上，译词和体例需规范。译词和《域外小说集》即体现了这种规范意识，周氏兄弟总结晚清翻译小说中出现的问题⁶⁾：人名及地名不规范，为方便年中国读者理解，直接改成了中国的人名和地名；随意改变小说体例，割裂小说章节，以适应中国古代章回小说体例；与中国社会不相符的情节被删去，破坏了原著的内容和结构。周作人对此提出人地名悉如原音、标点符号使用规范、典故加注释等，尽可能还原原文内容，汉语无法还原之处要加以注释，这样才称得上是“真翻译”。另一方面，在小说内容及思想情感上，周作人认为“任情删易，即为不诚”，因此要“无删减，无妄评，弗失文情”。因此，所谓的“真翻译”就是在还原原文的体例、篇幅和用词的基础上表达原文的思想情感，这在当时的翻译界具有极大的革新意义。

另外，周作人之所以被称为“鞠躬尽瘁的翻译大家”不仅因为其翻译活动时间长，更是因为在几十年的翻译生涯中，周作人一直将翻译当作个人与民族的事业来看待。一方面，周作人将翻译视为实现社会变革，救亡图存的民族事业。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对抵抗民压迫的话题格外敏感，因此五四前后到20年代早期，周作人也更多地将翻译视为救亡图存的民族事业，体现在其对

5) 周作人 1921.

6) 董小珊 2016: 5.

弱小民族文学的特别关注。周作人早期的翻译活动，被翻译界研究者称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翻译第一人，周作人译日本文学，符合其人道主义思想，也被视为一种革新中国文学，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手段。另一方面，周作人将翻译看做个人事业，同文学创作摆在同样的地位上。周作人曾探讨过“职务的”“事业的”“趣味的”三种翻译行为的区别，“职务的翻译完全是被动的，因职务的关系受命令而翻译……事业的翻译是以译书为其毕生的事业，大概定有一种范围，或是所信仰的宗教，或是所研究的学术，或是某一国某一时代的文艺……这是翻译事业的正宗，其事业之发达与否与一国文化之盛衰大有关系……至于趣味的翻译乃是文人的自由工作，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此是一种爱情的工作，与被动的出于职务关系者正是相反也。”⁷⁾周作人认为职务的翻译是被动的，趣味的翻译正相反，而这两种都不是他所认同的翻译观，只有事业性的翻译观才是“正宗”。而作家的身份令周作人对“翻译事业”有了独特的见解，不仅局限于将翻译作为一种职业的责任感，而是作为作家如何将翻译作为毕生的事业发展下去，“译者不以译书为事业，但只偶尔执笔，事实是翻译而当作自己的创作做去，创作的条件也是诚与达，结果仍是合格的译书，此盖所谓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正是妙事，但亦不易得，殆是可遇而不可求者也。”⁸⁾如何兼顾作家和翻译两种事业，是周作人毕生的追求与实践，作家身份令周作人更具有传达原作的责任感，以及自身对翻译工作的极大兴趣，所以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事业性的翻译思想。

（三） 翻译方法

周作人早期所采用的方法为“白话翻译”和“直译”，白话翻译法和直译法是相辅相成的。周作人的直译翻译观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界开了“信”之先河，周作人将直译思想付诸作品时，发现要保证译文符合原著的语言形式，用中文来构建外语的行文结构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作人提出了“逐字逐句”翻译法，译文与原文词语尽可能做到一一对应。在《陀螺》序中，周作人对直译法进行了辩证地解释：“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像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办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近汉语的能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思，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

最初的翻译实践中，周作人尚未明确提出对句法的要求，一直到了五四时期，随着直译思想形成，对语言形式的要求也逐渐明晰起来。周作人认为，翻译的本质应“不及原文，不像汉文”，认为自己的译文“重在忠实的传达原文的意思，……但一方面在形式上也并不忽略，仍然期望保存本来的若干的风格。”直译法必然会导致语言形式变革。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并非从一开始就使用白话文，《侠女奴》和《玉虫缘》就是用文言翻译的。但很快周作人意识到文言的问题，在《苦口甘口·谈翻译》一文中，周作人写道：“自从严几道发表宣言以来，信达雅三者为译书不刊的典则，至今悬之，国门无人能损益一字，其权威是已经确定的了……假如真是为书而翻译，则

7) 周作人 2002: 78.

8) 杨莉 2007: 5.

信达最重要，自然最好用白话文。”⁹⁾ 西方文学翻译是由林纾开创的，周作人认为林纾的译文存在问题且良莠不齐，但也十分尊重林纾的翻译，“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林译才知道外国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模仿过他的译文。”¹⁰⁾ 周作人通过对林译的反思，提出了“为自己而翻译”和“为书而翻译”两种概念，“为自己而翻译”便是指林纾用古文的翻译，上文中提到的“为书而翻译”指的是用白话文翻译。用古文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一种事倍功半的做法，不仅翻译的过程非常困难，死板而缺乏语法变化的文言也不能表达外国文学的风格与子项，翻译出的作品也和原作大相径庭。在《点滴》序中，周作人将直译和口语体联系起来，“……这几篇小说的两件特别的地方——一，直译的问题；二，人道主义的精神……我从前译小说，很受林琴南先生的影响；一九零六年往东京以后，听章太炎先生的讲论，又发生多少变化，一九零九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正是那时一时期的结果。一九一七年在《新青年》上做文章，采用口语体。”

综上，直译要求还原原文的风格与思想，就必须要求使用白话文，白话文为直译提供了实现空间。早期周作人的直译法也许过于完美，不具备充足的可操作性，周作人在日后关于翻译的论述中也有所反思。但在20世纪初，能够将白话和直译明确联系在一起，对中国现代翻译和现代文学的进步有着不可磨灭的革新意义。

二、周作人国语改造主张

五四时期，周作人的主张主要集中于思想革命和文学创作上，但同时也关注语言文字改造，在1922年发表于《东方杂志》的《国语改造的意见》中，周作人详细提出了国语改造的理论及方案。在1925年发表于《国语周刊》的《理想的国语》中，周作人再次提出国语改革运动的主张，前后主张并没有发生变化。探究现代汉语的变革，周作人的思想贡献和理论贡献都是不可忽视的。周作人国语改造理论形成之时，已有了多年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经验。可以说周作人的国语改造理论不仅是对白话文运动中各种声音的总结，也是立足于自身创作经验，在语言文字层面上的理论化。再加上周作人本身的古典文学修养和对语言的高度敏感，使其国语改造观具有独特性和系统性。基于20世纪初对国语问题的讨论，周作人认为从根本上改变言语是不可能实现，也没有必要实现，因为书写只是语言功能的一方面，对于国民来说，更重要的是利用本民族的语言能够便利地发表思想。“国民要充分的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一民族之运用其国语以表现情思，不仅是文字上的便利，还有思想上的便利更为重要：我们不但以汉语说话作文，并且以汉语思想，所以便用这言语去发表这思想，较为自然而且充分。”¹¹⁾ 周作人对国语持有冷静的态度，他认为“国语到底是我们国民利用的工具，不是崇拜的偶像”。同时，周作人所提倡的国语，不是民族意义上的国语，而是当时社会上所流通的。因此总结周作人对国语的

9) 刘军 2005: 10.

10) 周作人 1997: 25.

11) 周作人 1922: 19卷第7期.

态度，即既不主张过分拟古，也不主张民族主义。周作人所构想的“理想的国语”，是一种成熟的书写语言。在《国语改造的意见》中，周作人阐述了对国语改造问题的三个方面的看法：“国语问题之解决，国语改造之必要，国语改造之方法。”此时关于国语改造已经有很多讨论，周作人的意见主要集中在国语改造之方法上，包括国语的来源问题、语法改造问题、汉字简化问题以及社会各界的实施方式等方面。这些国语改造方法在二十世纪初似乎难以实现，但却为如何实现言文一致指出了方向，推动了现代白话文书写语言的形成。

在国语来源问题上，周作人对国语的构想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不缺乏辩证性，这也正是其中庸思想的一种体现。关于国语本身来源的问题，周作人的看法是辩证的，他认为以明清小说或现代民间言语为主都不尽合理。明清小说的问题在与文体单调，专于叙事，抒情和说理的功能不足；现代民间言语还未完善，不足以表现高上精微的思想情感，也不能作为艺术和教育的工具使用。“我们对于国语的希望，是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尽量的使他化为高深复杂，足以变现一切高上精微的感情与思想，作为艺术学问的工具，一方面在依这个标准去教育，使最大多数的国民能够理解及运用着国语，作他们各自相当的事业。”¹²⁾

周作人认为现代国语须是合古今中外的分子融和而成的一种中国语。实现这种理想的现代的国语，必须要在当时流通的普通语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周作人为现代国语寻找了三个可采纳的来源：第一，采纳古语中的助词和虚字，以表达丰富的情感；第二，采纳方言中的名物动词。第三，采纳新名词。可见，周作人的意见中，从中国固有的古语和方言中可采纳的成分并不包括修辞，在白话文写作中实现丰富的修辞，要靠引入外来词，周作人对与外来词的意见也是辩证的，“中国以前定名多过于草率，往往用一洋字去笼罩一切，毫无创造的新味，日常或者可以勉强应用，在同一的文学的国语上便不适宜了。”在激进改革的年代，周作人“理想的国语”也许很难得到实现的空间，但对后世翻译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发展形态却有着深刻的预见性。

在语法改造的问题上，周作人的意见中具有革新意义的一点是，认为不改造语法，输入新词的效果是极小的，即新词的输入要建立在严密的语法之上。这一点和他的翻译经验密切相关，因此周作人也提出了对欧化的看法。周作人所定义的欧化语法，不是从根本上模仿外语，而是在国语的基础上的优化。周作人对欧化的看法显然比其他五四先驱们更加柔和，他认为，“因为欧化这两个字容易引起误会，所以常有反对的论调，其实系统不同言语本来决不能同化的，现在所谓欧化实际上不过是根据国语的性质，使语法组织趋于严密，意思益以明了而确切，适于实用。”对于如何实现欧化，改造语法，周作人把这个问题回归到了翻译上，“普通有许多新文章，其中尤以翻译为甚，罗列着许多字样，表面上成为一句文句，而细加寻绎，不能理会其中的意思。这大约可以寻出两个理由来，其一是无文法的杂乱，其二是过于文法的杂乱；一是荒弃文法，以致词不达意，一是拘泥文法，便是滥用外国的习惯程式，以致出国语能力以外，等于无意义，这种过与不及的办法都是很应纠正的。”¹³⁾

12) 周作人 1922: 19卷第7期.

13) 周作人 1922: 19卷第7期.

在汉字的问题上，周作人对内容与形式不可割裂的关系有着很深刻的认识，将汉字改革视为国语改造中很重要的一部分，1922年周作人在《汉字改革的我见》中提到，“这个汉字改革的主张，我愿意把他当作国语运动里的一个附带问题。”汉字改革的实现需要语法改革作为前期准备，汉字改造分为简化写法和罗马注音两个问题。

在改造汉字写法的问题上，周作人的意见和钱玄同一致，即在保存汉字字形的前提下减少笔画。除了汉字简化方法，周作人还论及了汉字改造与白话文运动的关系，以及汉字改造的态度问题。晚清时期的白话运动和简字运动，属于启发民智的通俗教育中的一种，周作人清晰地认识到民国以后的形势变化。“先前的白话运动和简字运动，在初期的时候都是专替‘小民’设法，作为通俗教育之一种；但是民国以后形式一变，国语与注音字母成为全体而非部分的问题，于是这个运动才算上了正轨，可望逐渐的达到目的地了。这个汉字改革的主张，我愿意把他当作国语运动里的一个附带问题，不是特别去为不能够写笔画繁多的字的‘小民’而设的方便，正如‘白话浅文’并不是转给不能够念古文的人们去使用的一样。”¹⁴⁾

但在罗马注音的问题上，周作人发出了与时代不同的声音，并在五四白话文运动后的几十年里持续关注着汉字问题。周作人在二十世纪初的文章中赞成使用罗马字拼音，但在五四白话文尚未成熟的阶段，罗马字拼音很难实行，必须要通过“改定复音词类与合理的文法组织”¹⁵⁾来对汉字改革进行鼓吹和预备。这篇文章作于国语改造正如火如荼的二十年代初，废弃汉字改用罗马字的呼声高涨，但从周作人的论述中可以解读出他其实并不认为用罗马音代替汉字是可以实现的，周作人将使用简化汉字称为“预备的期间”，在预备完成之前废止汉字，国语便会沦为“安南语之流”。而如何才算是预备完成呢？周作人则称不能预言这个期间的长短，也可能是“无期延期”。周作人自身具备很高的古典文学修养，并推崇借鉴古语以改造国语，当然不可能支持废弃汉字。参见其1944年的著作，更能说明这一点：“只是为中国的前途着想，这汉字倒是很有用，我们有应当加以重视之必要。”周作人认识到汉字对于文化系统不同的外国人很难学习，但一国之文字根本上是为了本国人而服务的，“我们只问这汉字加入对中国本身是合用的，在政治意味上于中国极有利益，那么这就行了。”¹⁶⁾至于汉字对于异民族的困难等问题，“都可以暂且搁下不论，而且也可以暂不作缺点论。”

在国语改造如何实施的问题上，周作人能够站以历史的动态的方式思考语言问题，并站在社会的立场上看待国语改造问题，这是其国语改造理论的革新意义所在。周作人认为国语改造需要文艺界各个领域的学者共同努力，应当分为“国语学家”、“文学家”和“教育学家”三个方面同时去做。

在文学家方面，周作人的意见是“独立的开拓，使国语因文艺的运用而日臻完善，足供语文字典的资料，且因此而国语的价值与势力也始能增重。此外文艺学术的研究评论之文，无论著译，

14) 周作人 1922: 7.

15) 周作人 1922: 7.

16) 周作人 1944.

亦于国语发达大有帮助，因为语法之应如何欧化，如何始适于表现这些高深的事理，都须经过试验才有标准……”¹⁷⁾周作人将文艺工作者摆在了先驱的地位上，文学家、包括文学评论和翻译，是语言的开拓者，语法革新、白话文欧化主要靠文学家的工作来实现。

而国语学家和教育学家需要做的是国语规范和普及的工作。国语学家应致力于“编著完备的语法修辞学与字典。”词典的编撰方法也应该以白话文检字为便利，“以词为单位，又须包含两部，甲以汉字分部，从文字去求音训，乙以注音字母为分部，从音去求字训。”词典的编纂在白话文未成体系的时期很难实现，但周作人的意见和当今的词典已经非常相似，在当时具有超前意义。而教育家应该“实际的在中小学建立国语的基本。”周作人认为国语普及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人人能以国语自由的表现自己的意思，能懂普通古文，看古代的书。”二十年代废弃文言全面西化的呼声仍然高涨，周作人却不反对古文教育。但之前的古文教育有极大弊端，即只教形式而忽视其意义，学生只懂古文的刻板形式，却不能理解古文的文化内核，也不能用文章抒发自我意志。周作人认为“以前的教国文是道德教育的一种变相，所教给学生的东西是纲常名分，不是语言文字，现在应当加大改革，认定国语教育只是国语教育，所教给学生的是怎样表现自己的和理解别人的意思。”

三、翻译对国语改造的影响

五四运动前后，和其他五四先驱一样，周作人翻译活动和对国语改造的思考也是同时进行的，因此他的早期翻译理论与国语改造主张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同之处，翻译对国语改造的影响表现在语言和思想两个层面上。

首先，注重语言的修辞性是周作人在翻译和国语改造中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文学创作者，周作人在五四文学改革和白话文运动中所关注的一直是文学的书写语言。其在文学上主张“人的文学”，在翻译上力求“真翻译”，这些文艺思想和翻译思想的诉求表现在“理想的国语”上，就是一种拥有丰富修辞和表现力的书写语言。周作人认为文言最缺乏的就是丰富的修辞，而“理想的国语”便于国人自由运用表达情感，教育者可以运用其传递知识，文学创作者也可以利用比文言文具有修辞性的现代白话文丰富中国新文学的文学形式。周作人对书写语言丰富而细腻的修辞性的追求同样也表现在翻译中，所谓“真翻译”就是在保留作品原有的语言风格的基础上进行语言转换，而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所翻译的作品大多是描写底层人民生活的弱小民族文学作品，或者是重视人物内心情感抒发的日本近代小说，以及重视捕捉自然景象和瞬间灵感的日本诗歌等等。直译这些文学作品的同时，也是增强现代白话文描写性的过程。

另外，语言的丰富性也是周作人在翻译和国语改造中的共同主张。在国语改造问题上，周作人主张外来词语、古语和民间方言各有分工，同时采用外来语法。由于早年学习多国语言，以及

17) 周作人 1922: 19卷第7期。

日本留学经历，周作人对外国语言文化有很强的接受力，但周作人也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因此周作人从不主张彻底放弃中国传统书写语言的表达习惯。例如，周作人对邮票的意见，“国名不必写英文，价值可以用罗马字标明（也不是任何外国文），以便‘住在中国而不识中国文字的外国朋友’，而且大拉、生支等字也不适用，应该直译‘元’‘分’的音。这样办也并不一定是国家主义，只是理论应当如此，以求实在罢了。”¹⁸⁾周作人认为不能为了方便与外国人交流而全盘舍弃中国传统，戏称“中国人真大量，要使外国朋友便利，往往把自己的姓名也改变了。”关于世界语的意见中也体现了这样的特点。“世界语是国际语，并不是国语：我们可以期待人类都懂世界语，却不能想象他们废除了各自的国语。就是在理想的和平世界内，人们也有两种言语，一是自己的国语（或不称作方言），一是世界语。”在翻译中，周作人的“直译法”导致译文中充满了外国语言的表达方式，但在对直译法实践过程的思考中，周作人也意识到过度的直译会导致“死译”“硬译”的问题，这在本质上也是语言丰富性的问题。中国的语言如何实现既不完全被外国语言破坏，保留传统表现方式，又能充分吸收外国语言长处而增强修辞性，成为一种具有丰富性的语言，是周作人在翻译和国语改造过程中所不断思考和尝试的。

在思想层面上，周作人的翻译理论与国语改造主张存在共通之处，表现为中庸、辩证思想以及理想主义思想等方面。中庸思想贯穿周作人的一生，是其各个创作阶段的精神内核。中庸之道是儒家传统思想之一，中庸思想的核心是为人居于中正之道，不偏不斜，不走极端。中庸的追求是至诚或称至德所以，中庸之道亦被古人称为中道或中和之道。周作人的中庸思想来自于少时的私塾教育，“中庸对于周作人而言，是一种属于比较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熏陶的结晶，配合着个人的性格和后天的修养，最后融合成他的立身之道。”¹⁹⁾在思想革命的时代，周作人认为思想革命也需要做到中庸，即“伦理之自然化”“道谊之事功化”，在社会矛盾激烈，革命派与守旧派针锋相对的社会环境下保持思想的合理、自然比极端的主张更难，周作人认为中庸的主张是“旧的嫌过激，新的又嫌保守，大抵两不讨好也。”²⁰⁾但周作人五四时期的翻译理论和国语改造思想都遵循着中庸思想的准则。在翻译方面，周作人提出“直译法”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运用意译，借用原文词语、语法，保留原文风格的同时，也注意与“硬译”“死译”相区别。在国语改造方面，五四文人大多极端推崇语法欧化和借用外来词语，周作人却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晚清白话文运动所中在方言、古语中寻找白话文来源的主张，而不是摒弃传统追求细化，这也是其中庸、辩证思想的重要体现。

此外，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如其对国语的要求为“理想的国语”。这样的思想特征一方面来源于其自身对改革的极大期许，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文人社会上所流行的新理想主义思想有关。周作人所受到的理想主义思想熏陶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翻译工作，周作人在介绍日本白桦派作家时提到，日本文坛在二十世纪初所发生的变化源于理想主义向自然主

18) 周作人 1923.

19) 胡辉杰 2005.

20) 周作人，钟叔河 1998: 145

义的冲击，“自然派文学，描写人生，并无解决，所以时常引人到绝望里去。现在却肯定人生，定下理想，要靠自由意志，去改造生活；这就暂称作理想主义。”²¹⁾看到日本“理想主义”思潮的出现与新理想主义思潮间的密切关联，而通过当时他的外国文学译介，更能清楚看到，他把理想主义看作当时世界上正在广泛流行的思潮现象。²²⁾周作人对理想主义思想是赞同的，并在自己的主张中也充分体现了理想主义思想的特点，在国语改造方面，体现为他对白话文书写功能要求上。而在翻译方面，体现在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上以及对“真翻译”的追求上。

综上，周作人的翻译活动和国语改造活动在语言上互相影响，翻译理论和国语改造主张也具有共通的思想内核。

参考文献

- 董小珊. (2016). 周作人直译思想新探. 北方文学: 下 (12), P5.
- 顾农. (2006). 重温绝唱 读周氏兄弟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 博览群书 (4), P4.
- 胡辉杰. (2005). 周作人中庸思想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武汉大学).
- 刘军. (2005). 周作人与日本文学翻译. 鲁迅研究月刊 (6), P10.
- 钱理群. (1988). 周作人与五四文学语言的变革.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04), 149-163.
- 文贵良. (2017). 周作人: 国语改造与理想的国语.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039 (001), 29-39.
- 许钧. (2004). 翻译动机、翻译观念与翻译活动. 外语研究 (01), 51-55.
- 杨莉. (2007). 周作人翻译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 译林 (4), P5.
- 止庵编订. (2012). 周作人译文全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周作人, 钟叔河. (1998). 周作人文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 周作人. (2002). 周作人自编文集. 河北教育出版社.
- 张先飞. (2008). 五四前期周作人新理想主义观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69-86.
- 张铁荣. (1995). 关于周作人的日本文学翻译. 鲁迅研究月刊 (7), 38-44.
- 周作人. (1922). 国语改造的意见. 东方杂志. 第19卷第7期.
- 周作人. (1923). 反对中国邮票上的英文. 晨报副镌.
- 周作人. (1918). 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 北京大学日刊141-152号.

21) 周作人 1918: 141-152

22) 张先飞 2008: 69-86.

